融通古今，龙虫并雕

——语言学家王力先生百年诞辰纪念

陈 振 寰

（国际关系学院 中文专业，北京 100091）

摘要：王力先生是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奠基人之一；他在汉语音韵学、语法学、词汇——训诂学、汉语史、诗律学、语言学史诸领域都做出了重要贡献。他同时又是著名的教育家、翻译家、散文家和诗人。王力先生之所以成就过人首先在于他的为学术而献身的精神。他刻苦专一，博通古今，由博返约；他善于以科学的语言理论之矢射汉民族语言特质之的；他善于处理材料与观点间的辩证关系；他既富于创新精神，又勇于内省，故能不断前进。

关键词：汉语；语言学；融通古今；献身学术；用志专一；由博返约；求新尚真

中图分类号：K82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489(2000)01-0057-07

20 世纪马上要跟我们告别了。

作为人文科学中带头学科的语言学[①]，它在中国的发展，20 世纪是关键的时期：现代的、科学的语言学理论和方法是在这个时期被引进的，传统的语文学(Philology)是在这个时期得到初步的科学总结的，对汉语的历史与现状的全面、深入的研究在这个时期进入了全新的阶段。所有这些成绩的取得，都因为有一批才智突出、学贯中西、博通古今的语言学大师的引领，王力(了一)先生就是这批语言学大师中相当突出的一个。

王力先生是世纪同龄人，他 1900 年 8 月 10 日出生在偏远的广西博白县岐山坡村。他幼年家境困窘，上完高小便因贫辍学了。若换常人，或许就此沉沦，先生却胸怀大志，半工半读，在教家馆、办私塾、当小学教师的同时，十年间自学了借自邻里的 14 箱古籍，为其后的研究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国学基础。

1924 年秋，在亲友的资助下，先生远赴上海求学，先后就读于南方大学和国民大学。两年后，26 岁的他考入清华国学研究院，师从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陈寅恪。大师们博学明辨、务实求新的为学精神，给了王力极其深刻的影响。清华研究院一年的学习，可以说决定了他一生的学术道路。

1927 年冬，在赵元任先生的鼓励和亲友的资助下，先生赴法国留学，直接受教于法兰西学派代表人物房德里耶斯(Joseph Vendryes)，同时接受了提出过语言进化论的丹麦语言大师叶斯泊森(Otto Jespersen)的深刻影响。先进的语言学理论和方法，深深地植入先生心中。1931 年先生以《博白方音实验录》获博士学位。

1932 年回国后，直到先生辞世(1986 年 5 月 3 日)，54 年间，先生先后任教于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广西大学、昆明西南联合大学、中山大学、岭南大学、北京大学，始终没有离开高教讲席；他的学术活动也始终跟教育工作紧紧地结合在一起。在 54 年的学术活动中，他撰写了 50 多种专著、近 30 种译著、200 多篇论文，总字数约 1200 万，都是用毛笔，以蝇头小楷，一笔一划写就的。先生为学术献身的精神，他的勤奋与专注是很少有人能比的。

?1994-201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

王力先生的修养和成就都是多方面的，他不仅是一位世界公认的语言学家，而且是一位著名的翻译家、诗人（有《龙虫并雕斋诗集》）、散文家（有《龙虫并雕斋琐语》）、教育家。正象他的老师赵元任先生一样。“赵先生是由哲学家（哈佛哲学博士）、物理学家（康纳尔大学物理学讲师）、数学家（1925年在清华大学教授数学）、文学家（《爱丽丝漫游奇境记》的译者）、音乐家（名曲《教我如何不想他》的曲作者）做底子，最后才成为世界闻名的语言学家的。”[②]赵元任是王力最景仰的前辈；王先生跟赵先生一样，都是学界的通才！

王力先生首先是一位语言学家，他是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奠基人之一，“举凡语言学的各个门类如：音韵、训诂、词汇、语法、诗律都曾涉猎过，而且都有成系统的专著。”[③]

汉语音韵研究是先生语言研究的重心之一，在这方面他用力最勤，成就最大。他赴法留学主攻的是实验语音学，以《博白方音实验录》获博士学位。归国后在清华、燕京两校任教，首先讲授的便是《中国音韵学概论》。《中国音韵学》（后改名《汉语音韵学》）是先生正式出版的第一部语言学专著，这部书也是我国第一部用现代语音学原理，全面、系统地整理、介绍汉语音韵知识的教科书。罗常培先生盛赞此书拨开了传统音韵学的迷雾，以科学的语音知识给读者打好审音基础；对语音在时间和空间上的演变能够纵横兼顾；条理清晰，深入浅出。李方桂先生则评价它兼具入门教材、音韵发展简史和音韵学史略三方面的作用（参见《中国音韵学》罗序、李序）。这部书从1935年出版到今天65年来始终受到国内外音韵学界的重视——作为启蒙读物，它培养了几代音韵学者；作为学术专著，它在从传统音韵学转变为现代音韵学的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从《中国音韵学》问世到先生辞世前最后印行的一部专著《汉语语音史》（1985年5月），50年间，先生出版的音韵学专著有八种（不计论文集），论文近40篇（不计与音韵学密切相关的训诂、方言、诗律等方面的论文）。其中特别重要的有（依发表时间顺序）专著：《中国音韵学》、《汉语史稿》（上）、《汉语音韵》、《诗经韵读》、《汉语语音史》、《清代古音学》；论文：《南北朝诗人用韵考》、《古韵分部异同考》、《上古韵母系统研究》、《上古入声和阴声的分野及其收音》、《古韵脂微质物月五部的分野》、《先秦古韵拟测问题》、《黄侃古音学述评》（此文也是语言学史要著）、《古无去声例证》、《经典释文反切考》等等。

先生音韵研究的贡献，最重要的我认为有四点：一是总结、发展了清儒古韵研究的成果，提出了脂、微分部学说，从而构建起完整而系统的十一类二十九（或三十）部的古韵体系。古韵分部到清末民初的章炳麟、黄侃，已臻于完善，在没有更新的材料作为分类依据的情况下，已经难以出新了。章黄至今，音韵学者（包括笔者本人）虽然对古韵分部还提出过其他一些意见，但能够得到一致认同的，只有王力脂微分部一说而已。正由于王先生构建的古韵系统比较准确地显示了上古汉语韵类的完整格局，既符合《诗经》与群经用韵分合远近的实际，符合语音演变中阴阳入三声通转关系的实际，又能很好地呼应中古韵书所反映的语音系统，理所当然地得到学术界最广泛的认同，成为迄今国内外影响最大、为最多的文史工作者采用的上古韵系。

二是在批判了高本汉等人拟测古汉语音值所犯形式主义、机械主义错误的基础上，构拟了自己切合汉语实际的完整的上古汉语音值系统。先生否定了高本汉把上古韵部等同于中古韵摄的观点，认为上古韵部是韵文谐押的部类，每部的主要元音必定是相同的，换句话说，每个韵部只有一个主要元音；为了解释从上古到中古音系的发展，先生提出：上古韵部也有“开合洪细”之分，从系统上说，跟中古的“等呼”基本一致；先生指出高本汉等拘泥于谐声偏旁相通的痕迹，把上古汉语拟测为一种极少开音节的体系，是不合理的；他认为，阴阳入三分的学说必须维持，三类韵有三类不同收尾，阴声韵以元音收尾（包括无尾）、阳声韵以鼻音收尾、入声韵以清塞音收尾。

三是构建了“平入两类，各有舒促”的上古声调系统，既较好地解决了上古韵文中表现出来的中古四声远近通隔的关系，而且显示了上古调值的大致面貌。这是迄今为止对上古声调系统最好的设计。

四是较早地以理论和实践指明了一条通过归纳研究断代韵文和音释材料等来探求某时代汉语语音系统的路径。早在1936年，王先生就考查了南北朝诗人用韵，藉以“审核《切韵》的归类是否符合当时的语音系统”。其后，他又研究了一系列音释材料，并利用这些材料建立起各时期的断代音系，突破了传统音韵学仅以《切韵》为枢纽上考古音、下推今音的老路，使语音史的研究有了新的面貌。

?1994-201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

跟音韵研究一样，语法研究也是王力先生语言研究的重心之一。先生在清华研究院学习时完成的第一部语言学论著便是《中国古文法》。这部处女作虽不免带有初试锋芒者的弱点，还没有找到“中国语法真正特征之所在”④，但其立足点颇高，他立意要反对“以外国文法为楷”、“治中国文法，则当自其本身求之，不必以西文律之也。”⑤努力发掘汉语语法的自身规律，不以西文语法框限汉语语法，从此成为先生一生治语法的准则，也是他在汉语语法研究上取得巨大成绩的思想基础。无怪梁启超评价《中国古文法》说：“精思妙悟，可为斯学辟一新途径。”⑥先生正式发表的第一篇语法论文是《中国文法学初探》(1936)，先生称它“是一篇‘宣言’”，“确定了我的研究方向和方法”⑦。如果把它放到当时汉语语法研究的大背景中去评价，若说它是“文法革新的一声响亮的号角”绝不过分！它是公开打出“要反对模仿西洋语法，要寻求中国文法的特点”旗帜的第一篇文章，也是最有分量的一篇文章。由于它的“旨趣不在乎搜求中国文法里的一切系统，只在乎探讨它的若干特性”，因此它对所发现和涉及的诸多汉语现象及特性，并没有展开讨论，但是，却为后来汉语语法的深入研究提供了关注点，指明了大方向。

从《初探》到先生逝世后才出版的《汉语语法史》(1988)，50年间，他撰写的语法著作有13部专著(不计《古代汉语》)和40多篇论文，对古代汉语语法、现代汉语语法、汉语语法史研究，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其中特别重要的有：专著《中国现代语法》、《中国语法理论》、《中国语法纲要》、《词类》、《汉语史稿》(中)、《汉语语法史》，论文《中国文法学初探》、《中国文法中的系词》、《词和仂语的界限问题》、《汉语被动式的发展》、《汉语实词的分类》等等。

先生语法研究的贡献，最重要的我认为有：

一、作为文法革新的先驱者之一，他最为明确有力地论证了依靠模仿西洋语法来构建汉语语法的道路是行不通的，只有从汉语的实际出发，发掘汉语的特点，总结其结构规律，才是唯一可行的路径。他坚定地宣称：“语法既是族语的结构方式，可见离开了族语结构的特征，就没有语法”；“如果只知道套取语法的术语，而不知道说明特征，就等于不曾谈到某族语语法本身”；他宣称，他的研究目的，全“在于表彰中国语法的特征”，即使“违反西洋语法书中的学说也在所不计！”⑧

二、在发掘汉语语法特点方面独具慧眼，提出了一系列创造性的意见，他所总结出来的不少语法规律至今仍为语法学界所认同。例如：1. 1937年先生发表了《中国文法中的系词》，文章揭示了汉语的一个重要语法特点：主语和表明语之间不用系词——表明语为形容性者，古代现代均不用系词，表明语为名词性者，六朝以前没有真正的纯系词。这是中国语言学家第一次真正摆脱了西洋语法的束缚，实事求是地考察汉语本身特点而取得的重大成果。朱自清先生称之为“关系句子的基本结构，关系中国语的基本结构”的“重大问题”，“是中国语和印欧语根本差异处。”⑨对于纯系词产生的年代，后人虽有所补正，但丝毫不能影响先生这一发现的历史地位。2. 早在40年代，先生便提出了根据谓语性质划分汉语句子为以名词为谓词的判断句、以形容词为谓词的描写句、以动词为谓词的叙述句三种类型，打破了西洋语法动句、名句两分法的框子，至今为语法学界所承用。3. 早在40年代，先生便在分析汉语单句内部结构关系和表达效果的基础上，提出或肯定了能愿式、使成式、处置式、被动式、递系式、紧缩式等各种句子类型，这些完全属于汉语的“特殊的结构”的发现和相关概念的提出，极大地丰富了汉语句法学。其中有些类型，例如递系式，是先生首先和独立地发现的。此外，先生还最早提出把数词单立为一类，最先提出“句子形式”和“谓语形式”的概念，并较早地区分开“包孕句”与“复合句”，等等。结论本身和他的研究方法、分类标准，都对汉语语法研究有着深远的影响。

先生在汉语词汇——训诂研究领域，也作出了具有开拓性的贡献。他的注意力首先放在了词义研究上，尤其注意字典的编写问题。40年代初，他发表了好几篇讨论词义和字典编写的文章，其中以《理想的字典》(1941年报告，1945年正式发表)影响最大。文章郑重提出：应该取消为“经”而治小学，要为“史”而治小学；应该编写一部语源字典和几部分期字典。1947年，先生发表了《新训诂学》，进一步发挥了为史而治小学的思想，从理论上对传统训诂学进行了总结，明确规定了新训诂学所遵循的原则和方法，对科学的汉语词义学的建立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后，结合汉语史的研究，先生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汉语词汇——训诂研究的重要著作，如专著《汉语史稿》(下)、《同源字典》、《汉语词汇史》、《康熙字典订

?1994-201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

误》、《古汉语字典》；论文《训诂学上的一些问题》、《同源字论》、《汉语孳生词的语法分析》、《词义的发展和变化》等。

先生在词汇——训诂研究方面的主要贡献，我以为有如下几方面：一是从理论上总结了旧训诂学的成绩和缺陷，提出了新训诂学的方向、原则和研究方法。他把新训诂学定位于跟语音、语法并肩的语义学上；他反复强调研究语义必须首先坚持历史的观念，“对于每一个语义，都应该研究它在何时产生，何时死亡”；他强调一定要重视语义的社会性原则，同时还强调要把语义研究与语音、语法研究联系起来，强调研究语义一定要切忌穿凿，慎谈通假，凡此都极有启发性。二是注意总结汉语词义的演变规律，在这方面做出了相当显著的成绩，为后人的进一步研究铺平了道路。三是从理论到实践把同源词研究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他的《同源字典》和相关的系列论文《同源字论》、《汉语孳生词的语法分析》、《同源字典的性质和意义》等，是真正从语言学角度研究汉语同源词的里程碑。

吕叔湘先生在纪念王力 90 诞辰的书面发言中盛赞先生治学的专一精神，说他是把汉语史作为研究的主攻对象的。[10]的确，王先生在他步入语言研究领域之始，就确立了要为汉语发展立史的目标；他深入发掘古今汉语的本质特点，分门别类又互相渗透地研究古今汉语语音、语法、词汇，都可以说是为这个总目标做着准备工作。他的第一篇语言论文《中国古文法》就注意从发展上看语法问题，提出了“古文法”与“今文法”、“未固定之文法”与“已固定之文法”的概念。在他宣言式的著作《中国文法学初探》中，明白地表示：“关于中国古今文法的变迁，尽可以写成一部很厚的中国文法史”，1937 年他写了一部《中国语文概论》，核心内容就是概要论述古今汉语语音、语法、词汇的演变。1958 年，他把自己从 1936 到 1948 语言研究的代表作品集结成书，总题名为《汉语史论文集》，说其中论文都是“有关汉语史的论文。”这都说明先生为汉语立史的目标是一贯而明确的。

王先生是中国第一个在大学开设汉语史课、招收汉语史研究生的人，也是中国第一个撰写、出版汉语史专著的人。光这件事本身就值得永载语言研究史册。1957—1958 年出版的三册《汉语史稿》，不但为汉语发展史的研究确立了对象、任务、方法，为它构建了一个科学的框架，而且它既融注了先生二十年汉语研究的心得，也吸纳了国内外学者汉语研究的成果，可以说反映了当时语言学界关于汉语发展情况及其规律研究的基本面貌和水平。创业维艰，先生深知《史稿》还有不少粗糙之处需要化大力气打磨，他的晚年，包括文革受难的十年，始终未曾停歇对汉语史的琢磨，写出了一系列重要论文，完成了《汉语语音史》、《汉语语法史》、《汉语词汇史》三部著作，给自己的汉语史研究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汉语诗律研究是先生语言研究的又一重要领域，所做出的成绩和所产生的影响，可以说前无古人，且至今尚无人超过。1944 年先生完成了巨著《汉语诗律学》（近 80 万字），后来又写了《诗词格律》（销量已过百万册）、《诗词格律十讲》等书和一系列论文。先生研究诗律，并非只是通常理解的分析旧体诗歌的格律形式，而是以现代语言学观念和理论为指导，剖析反映在汉语诗歌这种特殊的文学语言中的语言结构规律。他不单研究旧体诗，还研究新诗；不单研究诗词曲的平仄用韵，还研究它们的句式和语法结构。早在三十年代，在《初探》中，先生就说过：要研究中国文法必先要体会中国人的心理，而最容易看出中国人对于词品的辨别的，就是骈文和诗歌。可见先生是把诗律（最初先生称之为“诗法”——“诗的语法”）研究纳入到他的语史研究、音韵语法研究范畴之内了的。而且，他不但把对诗歌语言形式的研究跟一般语言研究结合了起来，还把对诗歌语言形式的研究跟他对文学创作规律的研究结合了起来。在这方面，先生写过许多文章，如，《诗歌的起源与流变》、《中国古典文论中谈到的语言形式美》、《略论语言形式美》、《语言与文学》等。

除此以外，他还是中国现代方言研究的开拓者之一，早在清华研究院学习期间，就在赵元任先生指导下作过方言调查，写成《两粤音说》；他赴法留学，博士论文是《博白方音实验录》；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又曾调查珠江三角洲方言和海南岛黎语，发表了《东莞方音》等多篇调查报告。他撰著过影响很大的推普读物《江浙人学习国语法》（1936）、《广东人怎样学习普通话》（1951）。他还是汉字改革的积极倡导者，在汉字研究方面也有一些独到的见解。

王力先生几乎在汉语研究的各个领域都作出了很大贡献，这是跟他始终十分关注汉语言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分不开的。他很善于用历史唯物主义和现

?1994-201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

代语言科学总结古人和前人的研究成果，在前人的基础上更向前进。正因如此，他在语言学史领域也做出了斐然的成绩。他正式出版的第一部语言学论著《中国音韵学》，便用九节的篇幅介绍了古音研究概况，而且其他各章节后面都附录着有关的语史资料。李方桂先生赞扬说：这等于把汉语音韵学的略史写出来了。这种先总结前人的成绩与缺欠，再在前人的基础上向前跨步的表现，几乎偏见先生的论著之中。比如他的《新训诂学》，一半篇幅是对"旧训诂学的清算"。60年代以后，先生更投入时间、精力，撰述了一系列专门的语言学史类著作，重要的如：《中国语言学的继承和发展》、《略论清儒的语言研究》、《黄侃古音学述评》、《中国语法学的发展》、《中国语言学史》、《清代古音学》等等。这些著作，特别是《黄侃古音学述评》和《中国语言学史》，影响很大。后者作为中国第一部语言学通史，屡被引述，为中国语言史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础；前者甫一发表，立即引起国内外语言学界的广泛关注，讨论的余波，至今未息。

王力先生是一位教育家，他在教学研究与实践上，在教材建设上的巨大贡献是举世公认的。人们知道"王力"这个名字，与其说是因为先生有博大精深的学术专著，毋宁说是因为他执教54年弟子遍天下和他编著或主持编著的古今汉语教材通行海内外。以他主编的《古代汉语》为例，此书的初稿是1958年开始撰写的，当时，在王先生的主持下，北京大学汉语教研室首先认真总结了此前古代汉语教学的经验教训，确定了全新的教学方案，把古汉语课定位于语言课、工具课、基础课，教学目的是培养阅读古书的能力，确定了文选、常用词、通论三结合的体系，然后才在先生的主持下，以先生为主，动手编写。先生边写、边讲、边改，至60年底完成并印出了三册本讲义。61年又集中五所高校的教师组成古代汉语编写小组，在王先生主持下对北大讲义进行了修订改写，于62年底正式出版发行。正因为《古代汉语》凝聚了王力先生和众多古汉语学家的智慧和教学经验，内容充实、体系科学，符合学习者的认知规律，所以，问世至今近四十年，始终受到海内外学生、教师和一般读者的欢迎，印数以百万套计，长售不衰。不但《古代汉语》，先生的学术研究始终与高校教学紧密结合着，许多代表作都是在讲稿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的。例如《中国音韵学》、《中国现代语法》、《中国语法理论》、《中国语文概论》、《汉语诗律学》、《汉语史稿》、《中国语言学史》、《清代古音学》等等。结合教学进行研究，使先生的著作始终以玄虚之谈为戒，内容充实、例证丰富、表述清晰，时时留心学习者的接受能力，哪怕是专业性极强的著作，也总能深入浅出、论例结合，有很强的可读性。

我们在文章开头曾经说到，王力先生不但是个语言学家、教育家，而且是一位有成就的散文家、诗人、翻译家。先生把它的书斋命名为"龙虫并雕斋"，通常人们理解它是"专深（龙）"与"普及（虫）"并举的意思，说先生搞学术研究是普及与提高兼顾的，既有《汉语史论文集》中收录的那样高深的文字，也有《古代汉语常识》、《诗词格律十讲》那类普及的读物，这话自然是不错的。但王先生的本意却并不在于此。王先生在《龙虫并雕斋琐语》的代序《生活导报和我》中说：费孝通先生希望我为《生活导报》常写文章，就象曾发表过的《瓮牖剩墨》一类的小品，于是我答应写《龙虫并雕斋琐语》。"象我们这些研究语言学的人，雕起龙来，姑勿论其类蛇不类蛇，总是差不多与世绝缘的。有时一念红尘，不免想要和一般读者亲近亲近。因此，除了写一两本天书之外，不免写几句人话。"[11]可见"雕龙"指的是语言研究，"雕虫"指的是文学创作。

如果说搞学术研究更多需要头脑的冷静，那么搞文学创作就必须有对生活的热情。王先生有着非常冷静的头脑，同时又是个非常热情的人，是个十分关心国家、民族命运的人。他的散文创作，主要集中在抗日战争时期，在民族危亡的关口，先生恨不能"上马杀贼，下马作露布"[12]；于是举起笔，作投枪，以犀利的文词刺向顽敌，刺向时弊，刺向土豪劣绅，在当时起了相当好的作用。他的诗歌，则主要创作于1949年以后，特别是粉碎四人帮以后，他歌颂四化，缅怀先烈，述志咏怀，激励后学；他年届八十依然高唱："漫道古稀加十岁，还将余勇写千篇。"（《庚申元旦遣兴》[13]）"长征万里趁长风，何妨发白此心红！"（《浣溪沙》）真可谓热情如火，耄耋不衰！

翻译是另一种创作。先生是最早介绍法国文学到中国来的翻译家之一，早在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他便翻译出版了法国作家古拉、小仲马、乔治桑、莫里埃、纪德、都德等十余人的小说、剧本、传记作品二十多部。其中左拉的名著《屠槌》（195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时更名《小酒店》）、《娜娜》，在翻译界

?1994-201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

和读者中都有相当的影响。四五十年代，先生还翻译出版了其他一些作品；直到80年代初，还出版了波特莱尔的诗集《恶之花》。

纵观王力先生一生的学术道路，我们可以从中得到许多重要的启示。他所以能够取得那样大的成绩，首先得力于他那种笃学和为学术奉献的精神。王先生的确天赋过人，但这只是他成功的有利条件而已。他家乡偏处边远见闻不可谓广，他小学毕业便挑起了生活重担条件不可谓优；直到26岁，已为人父的他才有了接受正规语言学教育的机会，比起同辈和后辈学者，他起步晚得多了。他完全是靠着刻苦奋斗、为学忘我的精神才取得过人的成就的。他失学十年，苦读十年，打下了旧学的根基；他以高小学历考入大学，又以两年非正规的大学学历，考入了名师荟萃的清华研究院，得以亲聆梁、王、赵、陈等大师的教诲而终成大器，靠的就是这种奋斗精神。卢沟桥事变后，先生举家南迁，水陆辗转到了长沙。他苦于无书可读，在小摊上买到一部《红楼梦》，便一头钻了进去；他仔细分析《红楼梦》的语言，终于在昆明郊区农家猪舍改成的居室的菜油灯下，完成了语法史上里程碑式的巨著《中国现代语法》和《中国语法理论》。这不只是别具慧眼，更是迷醉于学术之中后的豁然开朗。文革期间，先生被打成“反动学阀”，房子被六户人家分占；他被强制劳动，经常揪批游斗，但只要回到自己的斗室之中，他便又伏案提笔了。我曾亲见先生当时在一间借来的狭窄的房间的窗下挥汗执毫的动人情景。他文革后出版的许多重要著作就是在那时构思和起笔的。王先生一生淡泊名利，刻苦克己，珍惜时间，用志专一。文革前后他都兼任过许多社会职务，要参加很多会议，但会议一散，他便又伏案读写了。吕叔湘先生说，他很佩服“王先生的珍惜时间，把所有可用的时间都用在治学上。王先生也有社会活动，也有其他干扰，但是他不让这些事情打乱他的工作。”[14]甚至在他去世前一年，身体已经很差了，“无论如何疲乏，他仍每天坚持工作，左手拿着放大镜，右手握着毛笔，鼻子几乎贴在桌面上，写呀写，每天至少写三五百字。”（王力夫人夏蔚霞《忆了一》[15]）正是这种心无旁骛的为学术而献身的精神，使他成就了旁人很难企及的伟业。

第二，搞学术研究必须有广博的知识基础和专一的奋斗目标。王先生很佩服他的老师赵元任先生，他说赵先生“就是因为有各方面的基础才取得那么高的成就的”。他多次谈到做学问必须“由博返约”的问题，反复强调要打好基础，掌握尽可能广泛的知识（他曾不只一次说自己吃亏在不懂数理化）和学好外语。王先生自己是由博返约的典范，他博通古今中外，兼擅语言文学；他涉猎宽广，龙虫并雕，但又始终把最主要的精力集中于汉语研究。在汉语研究领域中，他几乎无所不及，但无论研究语音、语法、词汇、诗律，总的目标都十分明确，那就是总结汉语自身的结构规律和发展规律，建起自己民族的语言学体系。他认为借鉴是必须的，先进的理论和方法是一定要拿过来的，但借鉴不是模仿，理论和方法只能是射的之箭。我认为这就是学术上的爱国主义！

第三，先生之所以取得过人的成就，还由于他牢牢掌握了科学的理论（唯物辩证法和现代语言学）与科学的研究方法。先生在《积极发展中国的语言学》中说：“有人说我的著作富于创造性，其实我只是根据语言学的原理来处理汉语研究的问题。学习了语言学的理论和欧美语言学家有关语言研究的著作，回过头来考虑我们的汉语研究，就能开辟许多园地，甚至可以产生新的理论。”[16]先生研究汉语，特别重视系统性、社会性、时地性的原则，特别重视语音、语法、词汇之间的相互联系与相互制约，特别重视历史比较，因为这都是普通语言学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先生之所以特别要求学生们学好外语，除了作为与母语比较研究的对象，更重要的是为了能够更好地学习借鉴外国的科学理论与方法。

第三，先生在研究工作中特别重视处理好观点和材料的辩证统一关系。他多次提起黎锦熙的名言：“例不十，不立法”。强调科学的结论必须建立在充分的材料的基础上面。他每提出一个看法，每下定一个结论，常常有十几个、几十个典型例证，绝不为凿空之说。但是，材料的占有、甄别、归纳、分析，归根到底都是为了支持一种观点，得出一个结论。先生说：充分占有材料之后，一定要分析材料的种种发展形态，并探究这种形态的内在关系，得出恰当的结论。（参看《我的治学经验》）正因为他能处理好材料与观点的辩证统一关系，所以能不断提出新的思路、开拓新的领域、结构新的框架，得出新的结论，始终站在不断发展着的语言学研究的前列。

最后我们还要提到王力先生那种不停顿地求真理、求新知的求新精神，那种勇于自省，时时自我审视，不断地否定过去的失误，寻求更新的起点的尚真

?1994-201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

精神。学术永远处在不断发展之中，真理总是相对的，自以为是、固步自封的人，那怕你有过很大的业绩，也只能把自己封冻在昨天。随便翻阅一下王力先生的著作，你都会发现王力先生对自己过去的观点、材料的补充、修正，对别人批评的重视、采纳，对不同意见的宽容、鼓励。我只举几个例子：其一，1954年《中国语法理论》再版，王先生写了长篇的《新版自序》，非常诚恳、深刻、实事求是地批判了自己的"三品说"；其二，1956年王力先生为自己的《汉语史论文集》作序，竟说《中国文法学初探》这篇"奠定了新的语法学的基础"（朱自清）的重要论文"几乎没有什么功力可言"，只是"确定了我的研究方向和方法"而已；其三，1985年王先生在《我的治学经验》中检讨了自己过去对戴震作了不正确的批评，不该说他是唯心主义，先生说："后来我想：戴震是对的""作为一个原理，批判它是不应该的"；其四，1981年他在给一个学生写的书作序时说：我并不完全赞同他的结论，为什么要为他的书作序呢？"这是因为我应该尊重别人的研究成果，我应该鼓励我的学生持不同意见。如果墨守师说，学术就没有发展了。"⑰我想，从这几个例子已经足够让我们看到一个真学者的风范了。

王力先生离开我们已经整整14年了，在他百年诞辰的日子里，让我们回顾先生的一生，用先生的精神鞭策自己，在新世纪中迈出更坚实的步伐！

---

① 皮亚杰(jean Piaget)："语言学，无论就其理论结构而言，还是就其任务之确切性而言，都是在人文科学中最先进而且对其他各种学科有重大作用的带头学科。"——转引自《语言学和现代科学》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6月第2版，第3页。

② 王力：《我的治学经验》，《高教战线》1984年第5期。

③ 朱德熙：《纪念王力先生九十诞辰文集·序》，山东教育出版社1991年12月版，《序》第1页。

④ 王力：《中国现代语法》自序，商务印书馆1943年1月版，第3页。

⑤ 王力：《中国古文法》导言，山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1月版，第3页。

⑥《中国古文法》总批，同⑤，本文卷首页。

⑦ 王力：《龙虫并雕斋文集》，《中国文法学初探·后记》，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51页。

⑧ 王力：《中国现代语法论·导言》，商务印书馆1943年1月版，第10页。

⑨《中国现代语法·朱序》，商务印书馆1943年1月版。

⑩⑭ 参看吕叔湘在王力先生九十诞辰纪念会上的书面讲话，见《纪念王力先生九十诞辰文集》，山东教育出版社1991年12月版，第9页。

⑪⑫ 见《生活导报和我》，《龙虫并雕斋琐语》代序，中国科学出版社1982年6月版，第3、5页。

⑬《庚申元旦遣兴》又称《八十自寿》。见《龙虫并雕斋诗集》，北京出版社1984年1月版，第118页。

⑮《王力先生纪念论文集》，商务印书馆1990版，第14页。

⑯ 王力：《积极发展中国的语言学》，《王力论学新著》，广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8月版，第41页。

⑰《中原音韵音系》王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10月版，第3—4页。

（责任编辑　驰　之）

?1994-201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